

## 梅列日柯夫斯基的文学批评

张冰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提 要:** 作为白银时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批评家、作家和诗人,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很少受到学人的关注, 而这是不应有的疏忽。作为宗教哲学批评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在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理论和实践诸方面, 都有极不平凡的建树。他所倡导的主观批评方法, 为整整一个流派奠定了基础。他在批评实践中所倡导的知人论世法, 对于今天我国文艺批评也是颇富启发性的。他的文艺批评贯穿着史识和对文艺本身的真知灼见, 不但在当时, 即使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 主观批评; 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和别尔嘉耶夫一样, 梅列日柯夫斯基也是在书房默默工作时离去的。死时 75 岁, 已是一个高龄老者。对于一个终生勤于笔耕的学者来说, 可谓死得其所吧。那是 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负责照看壁炉的仆人走进书房时, 猛然发现主人已死在安乐椅上。

梅列日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一生最大的瑕疵, 在于他曾于 1939 年发表电台讲话赞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他注定要终生为其鲁莽的举动而后悔。但他绝非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相反, 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疯狂和野蛮的。嗣后, 他更试图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反纳粹反一切专制集权主义的立场和意愿。但困扰他一生的这一污点却是甩也甩不掉了。对此, 他大约也曾后悔过, 对质疑他的友人解释说他这么做不是别的, 就是下作而已。也许是应了“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这句话吧, 梅列日柯夫斯基的名声致使他们夫妇都成了当时及以后一对“另类”人物。

梅列日柯夫斯基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诗坛的新气象。30 岁时, 就被当时出版的一本《百科词典》称为“著名诗人”。他和与他厮守终生的夫人吉皮乌斯相识于 1888 年。同年, 作家发表他的第一篇书评。此时他以诗人自许, 对批评家的声望无所萦心。他崇拜的偶象是纳德松。每个作家成名前都曾有过自己崇拜模仿的偶像, 都曾有过一个漫长的寻找自我的过程, 梅列日柯夫斯基也不例外, 而当时他所崇拜的, 就是 19 世纪俄国主流派诗歌。但是, 在他一生的全部创作中, 批评占有远比诗歌更显著的位置。

梅列日柯夫斯基和当局的关系不睦: 他创办的宗教哲学协会被波别多诺斯采夫取缔; 所发表文章受到审查机构限制; 《保罗一世》1908 年刚出版即被没收; 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手稿于过境时被扣压。梅列日柯夫斯基对沙皇当局也毫不客气。1906 年出国前夕, 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费洛索福夫 3 人曾拟组织群众集会, 宣告沙皇脱离人民, 用空口许诺欺骗人民, 政府只是靠暴力维持等等。彼得堡一时间传言纷纷, 说梅列日柯夫斯基将被逮捕。此后, 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巴黎出版《沙皇与革命》, 真接批判沙皇, 此文犹如对沙

皇本人的起诉状。

但梅列日柯夫斯基不是什么革命家。他也丝毫不以为“革命家”是个值得骄傲的称号。他是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民主自由的拥护者、沙皇专制政权不共戴天的仇敌和官方教会黑暗蒙昧主义的揭露者。梅列日柯夫斯基似乎注定要当一辈子侨民。他的祖先是于1564年被流放的库尔勃斯基伯爵，就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流放的侨民。1920年，梅列日柯夫斯基夫妇离开祖国。晚年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巴黎侨民文学界名望如日中天，甚至一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候选人，成为伊·布宁的竞争者。梅列日柯夫斯基夫妇二人一直是巴黎俄侨界著名的“周日沙龙”的主人。后来，从1926年起，该沙龙演变为带有一定私密性的文学哲学会或俱乐部“绿灯社”。19—20世纪之交，梅列日柯夫斯基的著作每每引起人们的批评，这也恰好说明梅列日柯夫斯基每每触到了时代的痛处。在巴黎时，他更加深入地思考历史哲学问题和宗教哲学问题。

梅列日柯夫斯基有权得到人们的尊重、同情和理解：他是一个对文学充满真诚之爱的真正的文学家。梅列日柯夫斯基永远为文真诚。善良的动机是支配其写作的主要动因，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永恒的伴侣》很短时间就再版3次；1913年和1914年还分别两次被收入全集。如果我们试图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述梅列日柯夫斯基批评的特点的话，那么，说他是采用形而上学方法进行文艺学思辨的，庶几与真相相距不远。对于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来说，采用这种方法应在情理之中。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多数人对于这种方法已经不再那么感冒了。俄国几代知识分子都曾受到来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大师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而这一思潮在文学上的最大代表即浪漫主义思潮。梅列日柯夫斯基生当其时，自是不能免俗。梅列日柯夫斯基永远是站在永恒——真善美的立场上进行批评的，他总是力求透过作家的表象，窥见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导精神或灵魂。这和后来的结构主义最基本的假说有相近之处。他喜欢称自己的方法为主观印象主义的，丝毫不顾及可能有的指责。实际上，梅列日柯夫斯基早在列夫·舍斯托夫之前就已在采用“灵魂中漫游”的方法，试图穿透表象直窥作家的本质。梅列日柯夫斯基和他的同道们自以为可与彼岸精神王国交通往来，彼岸赋予他们以“话语权”。关注作家的精神，就成为此派批评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普希金说过：“关注伟人的思想是一种有趣的科学”。梅列日柯夫斯基和列夫·舍斯托夫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以“关注伟人思想”为特征的批评。同时代人中，只有勃洛克是梅列日柯夫斯基的知音。他认为梅列日柯夫斯基无论写什么，你都可以察知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有一个艺术家所特有也应有的典雅趣味、精美语言、行文不乏任性、堪称性情中人的天生的艺术家气质。勃洛克的这番评述，是真正理解梅列日柯夫斯基批评活动的一把钥匙和一条阿里阿德涅涅线。

也许是秉承了俄国知识界的传统吧，包括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内的俄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直系传人，所以，他们在批评西欧作家时，丝毫也不见外，如数家珍。无论论述西欧还是俄国经典作家，批评家总是力求表现作品背后作家本人活的灵魂及其跳荡在字里行间的独特的生存样态。今天，人文科学界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文本是读者和作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因此，每个时代、每一代人都要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精神样态和视角对过去的伟大作家进行阐释。传统就是在这样一层层的阐释中获得其永恒的生命。

俄国传统美学十分注重人物相貌所传达的精神特质。梅列日柯夫斯基就体现了这一俄国特点。无论他分析哪位作家，都把对作家外貌和心理特征的分析放在首位。他笔下的屠格涅夫、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不但外貌酷似，而且精神风貌也传神。批评家这种“知人论世”的批评风格，达到了传神写貌的极致。

批评家在分析作家创作时，十分注意把握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为此，他往往需要付出比自己独立创作还要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大量一手资料。在分析别林斯基前，他曾研

究过别林斯基的3卷书信集，从中寻找作家的个性之谜，寻找理解作家创作的途径，进而理解整个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命运。批评家通过大量引文表现了别林斯基在一系列问题——女性、上帝、俄罗斯——上触目惊心的矛盾。你可以否认某一评判的正确性，但你却无法否认这样一种批评方法的艺术性。如对福楼拜的批评，梅列日柯夫斯基同样根据书信，力求揭示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个性心理特征，以及其身上道德人格意识与艺术人格意识的冲突和对立。福楼拜是个艺术至上论者。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福楼拜终生怀疑和否认上帝、宗教、进步、科学、人类等理念，可一涉及艺术，他马上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对他来说，美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一个具体的情欲对象，犹如金子之于吝啬之人；政权之于虚荣者；女性之于恋人。在他身上，理想生活遮蔽了对真实世界的印象，这导致了他悲剧性的孤独和与世界的失调。

梅列日柯夫斯基称拜伦、拿破仑、歌德、莱蒙托夫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的地震造成的山脊的顶峰。作家本人尤为看重写于1914年的文章《拜伦》，并曾写信给编辑力促其尽快发表。文章表明，作家为了写好拜伦，收集并查阅了与传主有关的一切文献，以至在生活细节方面也达到了巨细无遗的地步。如写拜伦在哈罗德公学时的轶事：一个高年级生用尺子狠抽一个低年级生。拜伦含泪走向前去，问：你还要抽多少下？关你什么事？我愿意代他承受一半儿！拜伦及长，甚至愿意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而身受鞭挞。这样的评述的确是见微知著、切中肯綮！

梅列日柯夫斯基还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文体大师。白银时代颇有几位思想家，以独创某种混合文体著称，如罗赞诺夫、列·舍斯托夫。但在这一实验上，梅列日柯夫斯基在首倡性上是不遑多让的。他在写批评文章时，不失其作家风范；而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又不失其文艺学家和批评家的风范。他是作家兼批评家兼文艺学家。梅列日柯夫斯基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融合。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其名著《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单行本，1893）中，为自己的“主观艺术手法”辩护，认为这种方法兴许会很有前途：诗人批评家有时比客观的科学研究者更易于洞悉创作的奥秘，天才的奥秘。拜伦、司汤达、福楼拜、普希金在书信和日记中偶尔就所读之书写下的札记，常常仅以暗示就能揭示出被职业批评家最下功夫写的文章更巨大的心理内涵和洞见。“主观批评”和“科学批评”同等必要，原因在于：伟人之伟大，并未被时间所消磨，而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新的时代会赋予其以新的躯体、新的灵魂。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是不会穷尽的。主观批评善于在反映一个读者鲜活印象的同时，比那些专事客观、只追求无畏的历史真实的客观批评能更好地揭示作品的内涵。今天，这样的观点更能得到人们的共鸣。现代科学已经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纯客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薛定谔的猫在观察者介入的一瞬间就已发生质变。观察者本身就是导致天平发生倾斜的最后一个砝码。

在梅列日柯夫斯基的体系里，神秘主义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但他所谓的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和形而上学的本意是一致的。神秘主义的存在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的标志，而并非我们通常所意指的怪力乱神。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发展的、有限的，任何时候，都有广袤的未知横亘在人类的面前。面对永恒的宇宙，人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梅列日柯夫斯基神秘主义的本意。正是人类世界的这种不可知性，才构成了象征主义的风格要素。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写于同期的另一篇文章《我们时代的神秘主义运动》中指出：导致人们漠视理念世界和精神品性的“经验知识”、科学、医学、实验室所代表的，不是完整的真理（知识亦然），而只是部分真理，是真理的一个方面。没有内心的圣火，理念生活的气息所堆积的经验知识、技术以及一切现代表层文明，仅仅只是躯体的外壳，是文化的肉体，是僵死的东西，而文化的目的则在于具有哲学意蕴的“神秘主义和宗教”。19世纪真正的儿子，不是那些既不懂得诗、爱情、上帝之信仰的资产者，也不是把人的灵魂当作一种装置的自然派艺术家，而是如歌德、叔本华这样的“神秘论者”。其他的则有拜伦、爱德加·艾伦·坡、福

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易卜生。梅列日柯夫斯基正是这样理解神秘主义的本质的。人类的知识之外，存在着神圣而又广阔的未知领域——这也正是所谓神秘主义的基础。

《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还表现了梅列日柯夫斯基批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社会学方面。终其一生，梅列日柯夫斯基都是一个关注其时代社会问题、冲突和矛盾的作家。因此，他不可能看不到文学与社会的深刻联系。他谴责革命民主派的倾向性和实用主义文学观。

他无论写什么，作品中都渗透着哲学、宗教和伦理思考。而他从事著述时，无不是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范畴出发。采用这种方法难免不使今人产生困惑：大千世界，问题多多，岂能将纷繁复杂、纠缠不休的一堆问题，简化为一对本体论范畴。抽象即简化——这是人所共知的。梅列日柯夫斯基的浪漫主义美学永远都要求两极化、极限化。他始终企求把正反题综合为一体。阿·索科洛夫写道：“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世界生活中存在着两极性，即有两种真理在争战：天空和大地、灵魂和肉体、基督和反基督……在历史进程中，在未来和谐的前夕，这两股潮流可能分化，但灵魂总是力求功德圆满的花环。梅列日柯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就建基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之上”（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23）。梅列日柯夫斯基精通各类文学批评体裁——书评、概论、文学小品、政论——但最喜欢的是文学肖像。他“文无定法，写法随对象的不同而每次都有变化”。但在集中写一个作家时，他常常广泛应用比较法，把作家与前人或同时代人做广泛比较。在每位作家身上，梅列日柯夫斯基都能发现其文学和社会演变的不同阶段，如对“被侮辱与被损坏的”形象画廊的考查，其他则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柯罗连柯。梅列日柯夫斯基善于对作家特点进行文本式细读批评，因而能深入揭示作家的创作特点。别林斯基认为研究普希金即等于研究一部俄国文学史；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研究普希金即等于研究一部世界文学史。在他的研究中，赖以比较的有荷马、柏拉图、老子、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化名人。

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第一阶段——颓废派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般说，对梅列日柯夫斯基有一个影响广泛的误解，即以为梅列日柯夫斯基和他那一派人，对传统、对经典采取了决绝的否定态度，实际不然。读过其主要批评论著后，就会明白，这位批评家实际上是很重视传统和经典的。在其所有批评论著中，传统和经典作家占有很大比重。俄国19世纪主流派文学大师和巨匠，几乎毫无遗漏地毕现于其笔端。对经典的阐释本身就包含着继承与革新两方面。梅列日柯夫斯基与传统和经典的关系，也只有深入了解其批评论著之后，才可能得到彰显。不但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而且，就连世界文学史范围内所有比较重要的作家，也都在梅列日柯夫斯基的精神视野里留了影。广泛的纵横向比较对加深对于所评作家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普希金作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代表和象征的地位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但在我的印象里，在梅列日柯夫斯基之前，还没有任何批评家把普希金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梅列日柯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评述，甚至可以说饱含着脉脉温情：“我们的普希金是惟一的、就像我们的初恋那样可一不可再的。我们还从未如此爱戴过任何人。我们也爱涅克拉索夫，但却爱得稍有不同，二人中我们对谁爱得更深，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普希金的缪斯是我们的未婚妻，涅克拉索夫的缪斯则是我们的姐妹或是母亲。总有些时候我们爱自己的妹妹或母亲。总有些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妹妹或母亲甚于恋人。我觉得此时此刻就正是这样的时候”（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44）。梅列日柯夫斯基对普希金的推崇，甚至到了以普希金为标准评判其他诗人的地步。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赫尔岑都表示不喜欢涅克拉索夫，理由是他写得不美。梅列日柯夫斯基则独创新论：不美吗？好吧，就算他（它）不美吧，可他（它）真实呀。要知道俄国艺术的主题就是真实。在此，梅列日柯夫斯基是在采用他衡量一个诗人的最高标准即普希金的标准来衡量涅克拉索夫。对于后普希金诗人的评判，梅列日柯夫斯基也总是用他们是否继承普希金的衣钵为依据。“俄国文学的悲剧在于她一步步地远离普希金，

而与此同时却又自以为她自己是在忠实地守护着普希金的遗嘱。对于伟人来说，没有比最亲近的学生更危险的敌人了，因为没有什么人能像他们那样，利用其处于伟人核心圈的地位，以一种貌似无辜的狡猾，在爱戴和崇敬的同时，彻底歪曲其导师的真实面目的了”（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42）。

俄罗斯式的形而上学思维要求以二元对立为基本的理论模式，梅列日柯夫斯基即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他的体系要求他处处站在理念的立场上观世论人。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梅列日柯夫斯基整个都是“基督教与多神教、肉体与灵魂、天与地、社会性与个人性、基督与反基督的对立统一”（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44）。对于这位诗人来说：“此世里的一切现象……都是彼岸世界响亮的橈杠，你只须略加敲击——琴弦便会响起；你只须稍稍触摸现象——本质就会回应”（Д.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44）。如“诗”与“文学”在他头脑里就是这样的对立范畴之一。一般人把这两个概念视为同一的，而他却不然，他不但把两者明确予以区分，而且还把这一“正题、反题”模式延伸到“作家”和“艺术家”的分野。诗是一种“原始的、永恒的、自发的、非生产性的、直接的神的才华”；文学同样也是诗，但却是从个别艺术家个人创作的观点出发所观察到的“诗”，它是一种推动整整几代人的力量，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力量。神的才华在不同时代、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下会有不同程度的实现。梅列日柯夫斯基认为：要让天才以最深刻的方式得以充分展示，需要有特点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下，在充满了特定的思想潮流、创造气息的环境下，“自发而又分散的诗的现象”才会凝结为“匀称强大的系统”。

如果这些对立的范畴在批评家笔下犹如毫无关联的两张皮一般，那是不会令人信服的。但梅列日柯夫斯基不然，读过他的批评论著后，你就会知道，它们往往融合无间，水乳交融，它们是如何才能融合到一起的，这——的确是个谜。

我们想要解答的，就是这个谜。

#### 参考文献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4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том 1[M], М.

## D.Merezkovskij as the Literary Critic

Zhang Bi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As an active philosopher, critic, writer and poet of Silver Age in Russia culture, D.Merezkovskij's critical activities were to be a little concerned with by the critical circle, that is an unsuitable oversight. As the one of greatest representatives of critical school in religion-philosophical movement, D.Merezkovskij has a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s idea,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s. H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is critical movement by his subject-critical methods. His critical method—to be aware of the man first to know his circumstances and history is suggested a great deal for our critical circle. His critical activities are full of 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knowledge about literature of itself, so it has a great signification for our today's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D.Merezkovskij; subjective criticism; theory/practice

**收稿日期:** 2004-01-05

**作者简介:** 张冰(1957- ), 男, 内蒙人,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文学及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 锟]**